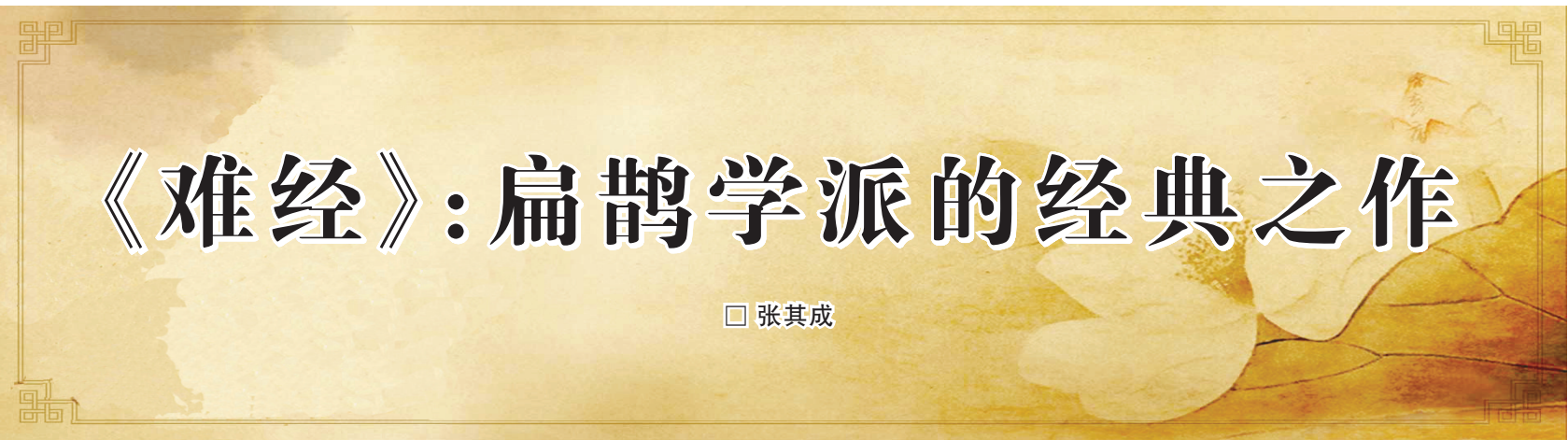




张其成

大家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吗？“《易经》不易，《难经》不难。”其实《难经》的“难”应该读nàn，是问难、质疑的意思，不是困难的意思。

《难经》和《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并称中医学四大经典。这四部经典都是汉代成书的，《黄帝内经》是西汉成书，其他三部都是东汉成书。

《难经》的作者之谜

《难经》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又称《八十一难》。全书共81个问题，采用问答方式。每一个问题采用的方式都是用“曰”字开头提出问题，然后用“然”字开头进行回答。但并没有说是谁问谁答。从《黄帝八十一难经》这个书名可以推测是黄帝问（当然是托名黄帝），作者回答。作者是谁呢？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是扁鹊。

扁鹊，原本是黄帝时代的一名神医，因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位叫秦越人的医生医术高超，而被大家称为扁鹊。司马迁曾在《史记》中为扁鹊秦越人立传。《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秦越人，是渤海郡郑（今河北沧州市任丘市）人。医疗经验丰富，长于脉诊。秦越人带着弟子不辞艰辛，周游列国，行程数千里，为了济世救人，随俗为变。他到邯郸时，得知当地人尊重妇女，就做了带下医（妇科医生）；到洛阳时，得知当地人敬爱老人，就做了专治老年人耳聋眼花四肢痹痛的医生；到了咸阳，得知当地人喜爱孩子，就做了治小孩疾病的儿科医生。他随着各地的习俗来变化自己的医治范围，是一位医技高超的“全科医生”。他在魏国曾经用针刺使魏国太子起死回生，在齐国曾准确判断齐桓侯疾病所在部位。他不仅精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而且擅于运用砭刺、针灸、按摩、汤液、热熨等各种方法。他的名声越来越大，被天下人称为神医“扁鹊”。

也正因此如此，所以遭到秦国的太医令李醯的嫉恨，最后李醯派人刺杀了扁鹊。

扁鹊在医学上最重要的贡献是脉诊。《史记》称赞他是最早应用脉诊来判断疾病的医生，“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淮南子·泰族训》也说：“所以贵扁鹊者，非贵其随病而调药，贵其摩息血脉，知病之所从生也”。其实扁鹊对望闻问切四诊都是很精通的，他可以通过望色判断病症变化，尤其在脉诊方面更是神奇，他发明了三部九候脉诊法，对其中的寸口脉诊多有体会，这些在《难经》里可见一斑。

那么《难经》究竟是不是扁鹊创作的？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有关扁鹊的著作有《扁鹊内经》《扁鹊外经》，但没有提到《难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也已经佚失。可喜的是2012年从四川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了920支医学竹简，后被整理成九部医书，其中部分医书，专家认为就是扁鹊学派失传的医书。竹简中出现的“敝昔”两字就是“扁鹊”。

《八十一难》的书名最早见于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难经》的书目最早著录于《隋书·经籍志》，而第一次明确提出《难经》是秦越人所作的人是唐代的杨玄操。从内容上看，张仲景在撰写《伤寒杂病论》时曾引用了《八十一难》文字，这些文字与今本《难经》互有出入。晋代王叔和《脉经》收录了一些《难经》原文，但些原文均不见于今本《难经》，估计另有传本。三国时吴太医令吕广曾注《难经》，这是已知的《难经》的最早注本。唐代杨玄操就是在吕广注本的基础上重新编次的。北宋翰林院医官王惟一又在此基础上进行校勘。后人整理成《难经集注》，成为通行本。

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肯定或否定《难经》就是扁鹊作的，但从《难经》诊脉、经络等内容看，与扁鹊是有关联的，至少可以看成是扁鹊学派

的著作。

《难经》对中医学的贡献

《难经》采用问答方式探讨了中医学的81个问题，内容涉及脉诊、经络等各个方面。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从《黄帝内经》（包括《素问》《灵枢》）里面提炼出来的，是对《黄帝内经》一些重要理论的发展，有很多观点是首创，所以被认为是《黄帝内经》的“羽翼”，和《黄帝内经》等并列入中医四大经典著作。《难经》全书81难可以分为六个部分：其中第1难至第22难讨论脉诊，第23难至第29难讨论经络，第30难至第47难讨论脏腑，第48难至第61难讨论疾病，第62难至第68难讨论腧穴，第69难至第81难讨论针法。《难经》首创了很多理论和方法，为中医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第一，在脉诊方面，首创“独取寸口”的切脉方法。“寸口”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老中医在手上撸动脉把脉的地方。这就把原本需要全身“三部九候”的脉诊法大大简化了。原来的“三部”就是上（头部）、中（手部）、下（足部），每部又各分天、地、人三候，共九候。而《难经》提出只需取中部手部的寸口就可以诊断疾病。把全身的“三部九候”简化为“寸口”的“三部九候”。即把医生三根指头按压的部位分为寸、关、尺三部，每一部位又根据按压的深浅分为浮、中、沉三候，共九候。两只手的寸、关、尺分别对应心、肝、肾和肺、脾、命。这是一种了不起的全息诊断方法，几千年以来一直被中医所使用。

第二，在藏象学说方面，创立“右肾命门”的学说，突出肾一命门的重要性。在《黄帝内经》中“命门”指眼睛，可《难经》却第一次提出右肾为命门。《难经·三十六难》说：“肾两者，非皆肾也。其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命门者，诸精神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这一观点为

后世医家广泛运用，成为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难经》建立了以“肾（命门）—元气—三焦”为轴心的整体生命观，在中医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在经络学说方面，第一次提出“奇经八脉”的概念，完善了奇经八脉（任脉、督脉、冲脉、带脉、阳维脉、阴维脉、阳跷脉、阴跷脉）的循行理论，对奇经八脉的生理功能、病理证候等作了系统阐述。此外还对《黄帝内经》的十二正经理论作了补充和整理，使十二正经理论更加简明扼要、条理清晰。这样正经十二脉和奇经八脉构成了经络学说的主体。《难经》首次提出“八会穴”的名称，对八会穴的临床主治作了论述，还完善了十二原穴、五输穴、俞募穴等特定穴位的理论及临床应用。

第四，在针法方面，首创“泻南补北”法，确立“补母泻子”法。这是《难经》根据五行生克规律提出的整体防治方法，反映了天人相应、内外统一的整体观。所谓“泻南补北”，就是对于肝气实、肺气虚的病症，采用泻心火（南为心火）、补肾水（北为肾水）的方法来治疗。这是《难经》第一次提出来的方法。所谓“补母泻子”，就是对于某脏（经）的虚证用补其母脏（经）的方法治疗，对于某脏（经）的实证则用泻其子脏（经）的方法来治疗。“补母泻子”是《黄帝内经》提出的，《难经》作了完善补充并作为一个原则被确定下来。

总之，《难经》虽然篇幅很短，只有12000多字，但对中医理论的贡献是巨大的，对后世医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作者系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首任院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政课有效融合的关键

姜珂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意见》将国民教育视作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点任务，围绕立德树人的任务取向，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彻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

思政课教师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输出的驱动力、作为立德树人的桥梁，既是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关键，也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入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关键。

价值维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认同。所谓政治要强，是指思政课教师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过硬的政治立场。思政课教师作为新时代的“传道者”，要做到能“明道”，尔“信道”，后“解道”。“明道”就是要求思政课教师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懂经典，明原理；“信道”就是要求思政课教师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地位；“解道”就是要求思政课教师能够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科学方法来看待问题，回应问题。所谓情怀要深，是指思政课教师要成为时

代的“参与者”。思政课教师是当代大学生灵魂的工程师，其承担着神圣而高远的育人使命。思政课教师应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响应新时代的发展诉求，葆有家国情怀、树立责任意识、常怀爱人之心。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道的过程中，思政课教师在政治和价值维度的素质养成，依赖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正确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充分了解中华民族的灵魂和精髓，才能深刻理解中华民族“从哪里来”的历史溯源；正确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价值，需要明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关系，才能准确把握中华民族“到哪里去”的现实脉络。

实践维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继承。所谓思维要新，是指思政课教师要顺应新时代的步伐，兼顾守正与创新。《礼记·大学》开篇写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亲民”“至善”为古时治学修身的“三纲”。何为“亲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君子需贯彻“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为人师者，不仅要关注自我更新，更要通过适当的方法引导和教育学生，培养学生的进取精神。新时代的思政课教师，既要注重个体德性的刚健日新，也要注重实践与方法维度的创新，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亲和力。在教学内容上，实现融会贯通、理论与现实相结合，做到既有深度、

又有高度、还有力度，激发学生对思政课的興趣。在教学方法上，不居高临下、不循规守旧，敢于、乐于与学生互动，勇于、善于引入新的教学工具，增强学生对思政课的参与感。所谓视野要广，是指思政课教师要立足于新时代的当下，高瞻远瞩，具有大格局、大视域。《礼记·儒行》写道：“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对于学者而言，丰富的知识、广博的视域，才是其最大的财富。见识广博，立意高远，才能达到“见博则不迷，听聪则不惑”的境界。新时代的思政课教师，在知识构成上，既是掌握专业知识的专业型人才，又是了解其他领域和学科的复合型人才，既能够立足于课本，又能够不拘泥课本；在格局构成上，既要了解历史，拥有历史视野，又要了解世界，拥有国际视野，能够正确地认识当代中国，客观地看待外部世界。具体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入思政课堂的现实实践中，思政课教师在实践与方法维度素质的培养，需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有机结合。

品格维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弘扬。所谓自律要严，是指思政课教师要以高标准要求自身言行。汉代董仲舒说道：“是故善为师者，兼美其道，又慎其行。齐时早晚，任多少。”意在说明，善为人师者，无论时间早晚、任务多少，既要懂得完善师道，又要不忘谨言慎行。“美其道”“慎其行”应是每一位为人师者约束自身德行最基本的要求。思政课

教师肩负着新时代立德树人、铸魂育人的高尚使命，承担着传播知识、明辨真理、塑造灵魂的任务，决不能表里不一、心口不一、言行不一。所谓人格要正，是指思政课教师要以高尚的道德品质净化自身的品格。师者，人之模范也；为师之“正”，在于师德。思政课教师既是学问之师，又是品德之师，要能够坚守以德正身、以德治学、以德施教，才能真正成为当代大学生的“筑梦人”“引路人”“系扣人”和“大先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提升师德的基因密码，提升新时代思政课教师在德行与品格维度的素质养成，可以深度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蕴藏，吸收与传承优质师德文化。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师者自古以来就是富有使命感的神圣职业，好为人师者，就需要有意识地培养和提升自身的“师者”素质。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视域下，新时代思政课教师要有针对性地完善“六个要”的素质培养，才能更好地贯彻“立德树人”和“育人铸魂”的关键任务，才能更好地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政课有效融合。



在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境内，有一座挺拔秀丽的鹅湖山，古朴庄严的鹅湖书院便坐落于这鹅湖山下。和白鹿洞、岳麓、嵩阳等著名书院一样，鹅湖书院也是以地点来命名的。不同的是，鹅湖书院的创建，源于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学术辩论会——鹅湖之会，从而让鹅湖书院四海闻名。

（一）

淳熙二年（1175年）四月，吕祖谦去福建拜访朱熹，商量编纂《近思录》，以便士子研习理学。返程时，朱熹送吕祖谦到信州（今天的上饶）鹅湖寺，因为离陆九龄、陆九渊的家很近，所以吕祖谦就趁此良机，约他们前来鹅湖寺集会，试图调和朱熹和陆氏兄弟之间的学术分歧，希望他们能够在学术上达成共识。陆氏兄弟如期而至，闻讯赶来旁听的，还有一些地方官员。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鹅湖之会。

朱熹和陆九龄、陆九渊虽然都宗奉北宋兴起的理学，但他们在修养道德的方式上，却有很大的分歧。大体上说，朱熹是主张通过“格物致知”的功夫，“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在持续不断的知识积累中，完善对自己及外物的认识，提升自己的修养。陆九渊则认为“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通过真切切的内心反省就能够恢复天理，而不必在意读过多少书、记住多少知识。他们的学说观点有较多分歧。于是，朱熹很想见一见陆氏兄弟，和他们进行深度的学术交流。作为朱熹和陆九龄、陆九渊共同的朋友，吕祖谦乐于从中斡旋，调和双方的学术分歧，于是便有了鹅湖之会这场学术盛事。

（二）

鹅湖之会进行了三天，每天都有一个主题。第一天，陆九龄、陆九渊先后向朱熹“举诗”。陆九龄在诗中一面提出自己的“心学”宗旨，一面指出朱熹的修养功夫过于繁琐。首联“孩提知爱长知欤，古圣相传只此心”，开宗明义，说人小时候就知道爱人，长大后又知道敬人，古代圣贤相传的，从根本上讲，只不过是人们自始至终都有的一颗仁爱、敬重之心。颈联“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认为朱熹专注于学习历代儒者对经典的解释，只会让自己陷入繁琐的知识中。陆九渊觉得陆九龄的诗还不够直截了当，无法彰显“心学”的根本特色。于是，陆九渊接着和了一首诗，首联“墟墓兴哀宗庙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把“心”提升到绝对、普遍的高度，意思是人只要能够恢复“本心”，自己就是圣人；颈联“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说朱熹的学问功夫过于琐碎，难以传扬光大。朱熹有些不高兴，以至于辩论无法进行下去，只得散场休会。第二天，讨论《周易》九卦的次序，朱熹和吕祖谦都为陆氏兄弟所折服。第三天，讨论教授他人的方法。朱熹认为，陆氏兄弟教人的方法过于简略，二陆认为，朱熹教人的方法太过琐碎。一方坚持先广泛、认真地读书，另一方坚持先领悟本心至善的道理，双方互不相让。最后，陆九渊反问朱熹“尧舜之前，何书可读”？三天论辩下来，朱、陆双方除了在某些经典解释上能够达成一致外，其他方面谁也不能说服谁，只好带着各自的坚持散去。

但是，这场辩论实际上给双方都带来了影响，鹅湖之会后，陆九龄开始注重知识的学习积累。朱熹则认识到自己的入德之方确实有些“支离”，开始留意对“心”的修养、体认、把持等问题，并将之置于自己学术的观照之下，促使他的理学体系更为系统、宏阔。三年后，朱熹追和陆氏兄弟诗作，表示“德义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也就是说，他始终敬重二陆的德行、风度，关心陆氏兄弟的学术进展。他自己以前的认识也因为鹅湖之会的讨论切磋日渐缜密，新的认识越发深刻了。



（三）

鹅湖之会成为中国哲学史上“朱陆之争”的开端，但其中双方认真思考、尊重不同学术意见等文化精神，持久地感召着后世学者。朱熹去世后，他的弟子徐子融就在鹅湖寺旁建立了朱熹、吕祖谦、陆九龄和陆九渊的塑像，纪念四位思想巨擘以及他们的鹅湖之会。之后，朱熹的另一门人陈文蔚又在鹅湖之会旧址建立祠堂，祭祀他们，表达对前贤的追慕哀思，称作“四贤祠”。淳祐十年（1250年），朱熹再传弟子蔡抗在江西任官，上奏朝廷，请求为四贤祠赐名，朝廷赐名“文宗书院”。元代，铅山知州窦汝舟将文宗书院从鹅湖山麓迁入城内，官派山长。元末战乱，书院被毁。明景泰四年（1453年），江西地方官韩雍、姚堂在鹅湖寺旁重建书院，命名“鹅湖书院”。后来，鹅湖书院历经多次修复，一直延续，至清代末年，改为鹅湖师范学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改为中学、小学，后来又被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天的鹅湖书院，又增添了传播国学的功能，前贤论学之地，弦歌再起，斯文一脉，至此不绝。

可以说，鹅湖书院得以创建、保存至今，和朱熹、陆九渊这两位学派宗师的思想贡献直接相关。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历来有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之分，朱熹集大成的理学和陆九渊开创的心学，虽然理论差别很大，却共同深刻地滋养着宋元明清时期以今天人们的心灵。

